

---

# 1949—1953 年农村生产的发展路向： 以山东聊城县为例

吴淑丽 辛逸

---

【摘要】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发展思路及路径的问题，历来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应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另一种强调国家可通过互助合作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地方实践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两种理论概括很难准确表达全国的总体发展方向。笔者基于对 1949—1953 年山东省聊城县的史料爬梳，发现两种发展倾向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以 1951 年抗美援朝运动与上级认定的贫富分化趋势为转折点，农村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转变看似偶然，实则背后有其必然性的因素。这也将重新启发我们对新民主主义实践情况的思考。

【关键词】 发家致富；抗美援朝；互助合作；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1—0176—09

【作者简介】 吴淑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辛逸，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100872

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生产的发展倾向问题，历来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国家应坚决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方针，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农村生产力。如刘少奇与薄一波虽论述不同，但在基本观点上都“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sup>①</sup>于光远认为，新中国应该“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一个根本的目标下调节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比重上和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而不是“马上接着搞以消灭资本主义乃至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认为建政后的“重大失误就是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必然的结果”。<sup>②</sup>邓子恢自 1948 年至 1952 年多次强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雇佣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也是为了促进农村恢复与发展生产力。<sup>③</sup>

另一种观点认为，土改后国家可直接通过发展互助合作过渡到社会主义。例如早在 1949 年 12 月，面对东北土改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高岗在政策倾向上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歧视单干，并禁止党员雇工与剥削。这实质上就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sup>④</sup>在其他革命老区，解放后互助合作即成为农村发展方向的例子并不少见。1943 年，革命老区河北省饶阳县的农民因饥饿贫困建立了互助合作组。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合作社逐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社章规定，农民净收入中 60% 按劳力分配；副业收入中 70% 按劳分配，30% 分给出资者。<sup>⑤</sup>沙健孙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开始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已“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 页。

②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自序，第 79、123 页。

③ 王丰《邓子恢与“四大自由”》，《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139—140 页。

⑤ 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3 页。

出来了”。<sup>①</sup> 欧阳国庆、谢迪斌坦言，“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完成‘过渡’，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sup>②</sup>

简言之，前者着重考虑的是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后者更看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发展前景。这两种观点将建政初的发展路径清晰地概述成两种趋势，体现了理论概括的优势。但过分强调某一种趋势，容易对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做简单化的理解。笔者基于山东省聊城市<sup>③</sup>的史料爬梳，发现自1949年至1953年间两种发展倾向在聊城市都有呈现，它们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这也许更能反映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聊城市而言，以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与农民贫富分化的凸显为转折点，前后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sup>④</sup> 前半段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倾向为主，中央致力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号召农民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发家致富”。时至后半段，上级发现农民私人化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国家的政治需求与工业化战略。以抗美援朝运动为契机、以互助合作为途径，中央开始不断强化农民“个人”与“国家”、生产与政治的关联，逐步从“致力于生产”转向“强调生产关系变革”。这种转变看似是偶然的，实则背后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它与上下级内存于心的社会主义发展共识密切相关，也与同时期中央领导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有关。

## 一 发展生产的现实需求

土改后，中央指示“在封建关系被打破以后，唯一的任务，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sup>⑤</sup>“保障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sup>⑥</sup> 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发展的总体方针。对此《党史》二卷也曾概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农业的恢复看作整个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强调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sup>⑦</sup>

从现实的战略考虑来说，国家确实有发展生产的需求。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一般较战前下降四分之一左右，老区虽经过几年生产运动的恢复，仍较战前低百分之十五左右”。<sup>⑧</sup> 国家需要集中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同时，发展农村生产也是支持工业的需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将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决定，但在全国范围内，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严重失衡，“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sup>⑨</sup> 提高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的比重，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任弼时指出，“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农业必须生产更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供给日益

① 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欧阳国庆、谢迪斌《也谈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林蕴晖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③ 本文所用人名，均做技术处理。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北地区，于1947年1月解放，是老区与半老区的结合。它曾隶属于平原省，1952年平原省撤销后，划归山东省。新中国成立之时，这里的民主整党与土改问题已进入收尾阶段。

④ 聊城市从政策层面上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并没将两个阶段截然分开。1951年之前乡村社会也有部分的社会主义发展倾向，之后党也重视农民的个人生产。笔者这样划分只是为了从总体发展脉络中，更清晰地呈现共产党农村工作重点的变化。

⑤ 《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1948年7月25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⑥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1948年7月27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28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⑧ 《中共中央批转陈云、薄一波关于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的报告》（1950年2月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17页。

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增加的工业需要”<sup>①</sup>。

除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发展生产也有着特殊的形势需要。1949年全国各地区都有异常严重的灾害,“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sup>②</sup>尤其是华北大部地区1948年冬天少雨,1949年春天缺雨,已呈严重旱象。平原省灾民已达212万,受灾地605万亩,占全省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sup>③</sup>为此,华北局要求地方“以抗旱生产节约备荒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sup>④</sup>中央还批评了部分干部“纠缠于结束土改、整党、评产量等工作转不过弯子来,忽视以生产为中心的偏向”,<sup>⑤</sup>要求各地“贯彻奖励生产的政策,提倡劳动发家”。<sup>⑥</sup>

与此同时,农民也有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以聊城市为例,1949年该县的土地已基本平分,土改进入收尾阶段。但1948年各级干部“以整党建政为中心,误了农时”,灾荒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生活的困苦。有农民反映“没吃的,非要搞生产不可。要不我们得不到实际利益。”<sup>⑦</sup>农民们没有“铁饭碗”,没有“口粮配给”,甚至没有任何应急的退路,“土里刨食的农民只有靠土地与热情来迎接挑战了”。<sup>⑧</sup>

基于上下层对发展生产的共同需要,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8月发布取消战勤动员命令,宣布“华北已完全解放,今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建设”。这标志着华北地区已由革命战争时期转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1949年10月1日至12日,平原省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确定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省委特别指示,尤其是老区、半老区“都须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完成结束土改、整党建党工作”。<sup>⑨</sup>聊城县委据此召开全县党员干部大会,着重确立了今后的工作方针,“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均必须围绕这个中心并为之服务”。<sup>⑩</sup>

## 二 生产战线上的“发家致富”

工作重心确定后,聊城群众并没有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反,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此抱有一定的异见或顾虑。具体来说,一些农民以为“土改后可以老守田园的过日子”,“不求过富只要饿不着就行”;一些思想上“怕共堆、怕社会主义、怕吃大锅饭”,认为“形势发展越快,共堆也越快”;一些有“喜穷”的思想,认为“穷光荣”“穷撑劲”,“可以靠斗争吃饭”;<sup>⑪</sup>还有的群众基于之前过激的土改复查,怀疑上级鼓励发家致富的政策。

针对全省农民普遍存在的生产顾虑,1950年2月27日至3月16日平原省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生产问题,并对阻碍发展生产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参会时做了重点发言,他把“穷光荣”、怕致富、怕说“剥削”、怕“社会”等错误观点提高到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批判,并指出这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他还强调,土改后经济一定要

①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468页。

②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1950年6月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③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平原省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④ 《中共华北局关于抗旱生产、节约备荒的指示》(1949年5月19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4页。

⑤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第205页。

⑥ 《中共中央批转陈云、薄一波关于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的报告》(1950年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卷,第117、119页。

⑦ 《聊城市党代会会议零记》(1949年10月28日),档案号:3—1—2,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⑧ 韩丁:《深翻》,《深翻》译校组译,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⑨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平原省简史》,第16—18页。

⑩ 《聊城县委关于全县党员干部大会报告》(1949年6月),档案号:3—1—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⑪ 《聊城县上半年宣教工作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27日),档案号:3—1—2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分化,这是正常的。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也深刻指出:怕“超过一份”,怕“阶级分化”,“这种思想严重地束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会议再次强调,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团体均应以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时省政府发布了保护与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其中包括:必须确保人权、地权、财权(在地方档案中简称为“三权”——笔者注)不得侵犯;保证农民对土地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允许农民自由经营;保护贸易自由,鼓励私商从事土产购销;保护自由借贷等。<sup>①</sup>这正是为了“建构起一个能够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业经营机制”。<sup>②</sup>

聊城县委为落实上级政策,召开了县区村党员代表会议,目的是“解决群众不敢大胆地劳动生产,不敢发家致富的思想顾虑”。<sup>③</sup>县委还着重强调了奖励生产及减免负担政策,“对同等土地因多劳增产者,不增加负担;对懒汉而收成不好者,亦不予减免”。<sup>④</sup>为澄清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县委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普遍宣传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宣传中主要把握的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共大堆吃大锅饭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社会主义也不是坐吃懒做,不好好生产发展仍有困难,仍要受穷受罪”。<sup>⑤</sup>宣传部为各级干部翻印省政府生产政策,要求各级宣传组织利用各种会议、黑板报、广播筒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小学和民校把省府布告作为政治课重点内容向学生和群众讲授。各区均涂写了地委印发的生产标语,帮助群众了解生产政策。

在不断的宣传教育下,群众开始相信上级推行政策的决心。如一区杜庄村长王德豪说,“过去对政策怀疑,这回可把政策写到墙上了,三权看来要确实保证”。李庄中农李玉田说“上级政策写在墙上,任何人不敢违纪,看村干是否按这样办事。”<sup>⑥</sup>结合“三权”政策,宣传员努力纠正一些人“喜穷”的观念,如宣传“有吃有穿有东西最光荣,不好好生产过穷了最可耻”。六区赵庄贫农赵光耀了解到政策,说“共产党不老向着穷人,以后得好好劳动过日子,指望不下力是不行”。经政策宣传,群众了解到“今后的发家致富和以前的地主富农不一样”。四区王官屯的王玉河说“上级保障三权,不要怕过富了。过好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这样光荣。”二区张元宝说“谁生产好了谁就享福。地权、房权已经确定了,谁再随便动别人的财产谁就犯法。今后咱们都好好生产吧。”<sup>⑦</sup>群众对“发家致富”动了心,开展了无顾虑地自由借贷、买卖土地与增添农具。据六区孙集行政村三个自然村的调查,八户中农放出粮食3760斤,买地的4户,共13亩。<sup>⑧</sup>

发家致富也不完全是个人化的生产,农民也在中央的倡导下自愿组织互助合作。早在1948年7月,中央指示解放区“由于土地改革后,土地、耕畜、农具等相对分散,加上长期战争的消耗与敌人的破坏,造成农村人力、畜力及生产资料之不足,因此更需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互助”。但这时发展的互助合作“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是自愿结合的”,“必须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而且“一切劳动人民都可以成为组织合作互助的对象”。<sup>⑨</sup>由此可见,当时提倡的互助合作更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所以并不介意入组人员包括地主与富农,也不介意“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中央还强调“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sup>⑩</sup>

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央提倡互助合作的决策与农民的生产需求具有一致性。土地改革之后,农

①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平原省简史》,第27—28、84—85页。

② 王海光《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之管窥——以〈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年)为研究文本》,《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③ 《5月份终工作报告》(1950年5月)档案号:3—1—17,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④ 《7月份终工作报告》(1950年7月)档案号:3—1—17,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⑤ 《聊城县上半年宣教工作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27日)档案号:3—1—2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⑥ 《聊城县上半年宣教工作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27日)档案号:3—1—2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⑦ 《5月份终工作报告》(1950年5月)档案号:3—1—17,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⑧ 《聊城县上半年宣教工作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27日)档案号:3—1—2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⑨ 《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1948年7月25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21页。

⑩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题》(1948年7月27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24—25页。

民分得的土地更加狭小分散,单个农户缺乏足够的农具、畜力与资金。农民为进一步发展生产,需要初级形式的劳动互助。正如《深翻》所言,“人们愿意试一试互助这种形式的原因,不是由于哪一级领导的号召,而是由于经济利益”。<sup>①</sup>聊城县1950年的互助组大多采用互助换工、向亲友借取牲口等初级形式。七区付振文、付振名、付永泰三家的这个组采用互助劳力的方式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个组的分工是两个人“在家里负责家里地里一切活”,另一户出去做买卖,“到北京推锄板”,他利用北京与本地的差价销售20天共赚麦子670斤,“做到了生产副业两不误”。县委称赞道,“像这样的互助组,也是今后我们发展的方向”。<sup>②</sup>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互助形式,“不仅没有侵犯到个人在土地、农具、牲畜、作物方面的私有权,反而提高了相互合作的效率与组织性”。<sup>③</sup>总之,在这个时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sup>④</sup>

### 三 生产与政治需求相结合

“发家致富”的生产教育活跃了农村的个体经济,但以个人致富为旨向的生产路线到1951年下半年发生了一定变化。由抗美援朝运动引起的乡村之变是发生转向的契机之一。运动中,上级发现农民专心于自家致富,对抗援捐献认识不足,政治情绪涣散,急需加强个人生产与政治需求之间的关联。

具体到聊城县,在面对生产与抗美援朝之间的关系时,有的干部抱怨“抗美援朝运动耽误生产,应把精力放在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上”。<sup>⑤</sup>有的干部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与其他宣传活动一样,是党务部门或宣传部门的事情,与生产上的发家致富无关”。<sup>⑥</sup>许多农民更是从个人观点出发,不愿为抗美援朝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纷纷表示,“怕战争一来,就公粮重、要求参军”。对此还有人讥讽道,“地拿粮,人和牲口也拿粮,赶明儿鸡鸭鹅狗都得要粮”。<sup>⑦</sup>有的群众抱怨,“反正一打仗得参军。不管怎样,要打仗不出东西就出人”。<sup>⑧</sup>还有一些农民觉得抗美援朝与自己的生活很远,认为“你抗你的援,我生我的产,没什么相干”。这种现象被县委批评为“单纯从个人利益出发,没有先想着国,而后再发家”,归根到底是“对生产的目的性与政治性认识不足”。<sup>⑨</sup>

1951年8月平原省召开省扩大干部会议,指出这种与政治相分离的工作倾向“抵抗着党的政策路线的贯彻,削弱着党的战斗力”。省委要求地方开展“反对不问政治倾向”的斗争,“克服和平麻痹、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把生产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sup>⑩</sup>为此县委专门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重点批判干部“不问政治”的倾向。县委总结干部们“不问政治”的原因是,“近两年生产工作提到重要位置”,“党务机关放松了思想政治领导,有些同志不顾其余地专心生产建设”。<sup>⑪</sup>会议指出,“不问政治的倾向其实是党内小生产者的表现,再进一步就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除了无产阶级思想是合法的,党员干部的其他思想都是非法的”,“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要反对

① 韩丁:《深翻》,第67页。

② 《5月份终工作报告》(1950年5月)档案号:3—1—17,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③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7页。

④ 韩丁:《深翻》,第85页。

⑤ 《中共聊城县委抗美援朝检查报告》(1951年9月26日)档案号:3—1—27,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⑥ 《聊城地委关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综合报告》(1951年5月26日)档案号:3—2—24,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⑦ 《1950年下半年县宣通知指示》(1950年12月15日)档案号:3—1—2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⑧ 《聊城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宣传总结》(1951年1月30日)档案号:3—1—3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⑨ 《王政委在第三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1951年)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⑩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平原省简史》,第472—473页。

⑪ 《聊城市第三次党代表会议记录》(1951年)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不问政治”。<sup>①</sup> 县委强调，“今后每个干部要不从政治出发，就叫政治落后”。具体到现实的生产工作中，则要求“干部必须将政治与生产结合起来，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sup>②</sup> 这其实是对干部的生产工作明确提出了“政治化”的要求。

针对农民“埋头生产、不愿奉献”的行为，县委认为，“农民是好的，但农民意识不一定好。农民意识产生的只能是自私自利的小农经济”。<sup>③</sup> 这显然不符合国家的政治需求。为加强国家与生产之间的关联，县委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广泛宣传“爱国是发家的前提”“自己的过好日子要与爱国结合”“今后的生产要与政治相结合”等观点。<sup>④</sup> 原因是“只有现在人民政府时代，经过土改有了发展生产的奖励政策，农民才有发家条件。国家为农民创造条件，农民也应对国家担起责任”。<sup>⑤</sup> 县委还要求各区召开群众会，启发群众回忆诉苦，对比新旧社会，帮助群众认识“没有祖国就没有家”。<sup>⑥</sup> 这时的农业生产已不再只是为着个人的发家致富，而要与增援国家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生产要为政治服务，要与国家的政治需求相结合。

其实当县委响应上级指示，强调生产与政治相结合时，已经在自下而上地酝酿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在于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势，鼓励农民的致富自由。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上级发现农民埋头于个人致富，不能满足国家的政治需求，因而开始强调“政治对生产的领导作用”。县委更是清晰地认识到，为抗美援朝开展的爱国丰产运动“关键在于加强对生产的思想政治领导”，而这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sup>⑦</sup> 虽然县委承认时下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理解农民的个人需求，但明确指出，“光从个人出发，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领导群众生产，农民会失掉前进方向”。<sup>⑧</sup> 当上级试图引导农民的生产方向时，其实就是在明确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 四 互助合作的发展转向

在发展生产的变革方面，引起中央更广泛关注的是农村中的贫富分化问题。是否需要抑制富农倾向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争论的焦点。争论过后，互助合作提上中央的议定日程。自此开始，党的生产管理逐渐由“致力于生产”转向“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从重视农民“个体积极性”转变为强调“组织起来”。

事情的起因源于生产发展后各地出现的部分富农倾向。自贯彻发展生产的中心路线后，农村贫富分化的苗头开始出现，聊城市也不例外。经过几年的生产，一些农户逐步有了积蓄，成为富农。如三区吴庄的副支书吴金平有60亩地，七口人，两头牛，雇工一人，忙时再觅短工，并囤积货品。六区齐屯的党支书李保森有近40亩地，六口人，一头牛，地全部佃种。二区罗庄的李田丰计划三年内买地150亩，以求进一步致富。<sup>⑨</sup> 大部分群众都在计划如何致富。同样的现象在山西亦随处可见。山西省委认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sup>⑩</sup>

围绕山西省委的意见，中央高层展开了争论。以刘少奇为首的部分领导人所持观点是，“中国

① 《县委会议总结报告》(1951年8月25日)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② 《王政委对前段工作的总结与检查》(1951年9月1日) 档案号:3—1—26,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③ 《王县长在区书区长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8月6日)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④ 《政府今后工作意见》(1951年)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⑤ 《县委对三大运动的总结和检查》(1951年)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⑥ 《九月份反美爱国思想运动总结》(1951年10月15日) 档案号:3—1—3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⑦ 《王县长在区书区长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8月6日)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⑧ 《王政委在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⑨ 《三年来生产建设运动情况的总结》(1951年) 档案号:3—1—29,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⑩ 《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1951年4月17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35页。

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要发展生产,仍然需要依靠最有能力的那部分农民的个人积极性”。<sup>①</sup>毛泽东逐渐改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认为“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土改完成后,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如何对待“新富农”,“要不要立即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sup>②</sup>经过讨论,毛泽东的观点占据主导意见,从而结束了争论。1951年9月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强调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方向。同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虽然肯定了集体与个人的两个积极性,但重点仍放在互助合作方面。中央明确提倡“组织起来”,指明农村的发展前途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sup>③</sup>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平原省委批评了农民“单纯致富”的倾向,并指出以往所犯的 error 主要是“单纯地提倡生产致富”,“强调保护与鼓励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而“对组织起来的方向贯彻不够”。省委还反思了曾经“允许党员雇工”等资本主义剥削行为。<sup>④</sup>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明确生产方向,充分认识小生产者自发趋势与“组织起来”的矛盾,加强对农民的前途教育。

当时聊城市在贯彻“一切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借着爱国互助生产竞赛,互助合作与抗美援朝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农民以互助组为单位订立爱国公约,能起到内部成员相互监督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扩大捐献数额。<sup>⑤</sup>当然,发展互助合作不仅是为了抗美援朝,更重要的是明确“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方向”。<sup>⑥</sup>县委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阶段,不是未来的方向。互助合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合作化更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目前要通过抗美援朝把合作化继续提高一步”。<sup>⑦</sup>

县委虽然鉴于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反对群众买卖土地”,但明确表示“组织起来是集体的发家致富,不是单纯的卖地致富”。<sup>⑧</sup>而且在宣传教育上,县委不再宣传个人的“发家致富”,而是强调“对互助合作的政治领导”。上级虽然不明文反对群众的雇工或富农化行为,但开始批判“党员发展为富农或雇工的剥削行为”。<sup>⑨</sup>县委书记在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明示,“有的党员存有剥削思想,有了余力光想个人致富,不愿参加互助合作,这样党员与农民就没有区别了”,归根结底是“这些党员不了解国家的发展前途”,“现在是新民主主义制度,这只是革命的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农业集体化”。<sup>⑩</sup>县委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要求与当时中央对共产党员的政策标准有关。1951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即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sup>⑪</sup>这其实是对党员责任与行为的方向要求。次年,中央又指出,当前“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但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做富农”。<sup>⑫</sup>实际上,早在1951年县委在布置冬季整党工作时,已经领会到上级意旨,“在新民主主义社

①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5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135、13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12月),《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38页。

④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平原省简史》,第471—472页。

⑤ 《九月份反美爱国思想运动总结》(1951年10月15日),档案号:3—1—33,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⑥ 《县委关于冬季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2月17日),档案号:3—1—40,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⑦ 《王县长在区区长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8月6日),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⑧ 《县委对三大运动的总结和检查》(1951年),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⑨ 《我县党员大会的总结报告》(1952年6月9日),档案号:3—1—38,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⑩ 《县委对三大运动的总结和检查》(1951年),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4月9日通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⑫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分党员党籍问题的新规定》(1952年6月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会允许私有制存在并加以保护。在党内要认清这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党员要与群众区别开”。<sup>①</sup>这其实是在划清党内外关于新民主主义现时阶段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界限,也预示着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已为时不远。

互助合作在上级的积极推动下,深入开展起来。截至1952年5月底统计,聊城县的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共6788个,吸纳农民33759户,占总户的36%;长期定型的互助组437个,10903户,占总户的16%。<sup>②</sup>这时提倡的互助合作与之前相比,正发生实质性转变。之前的互助组更多是基于生产发展的需求,后来则更多为了防止贫富分化,致力于生产关系的改造。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组织形式仍属于小农基础上的优化调整。正如高洁、辛逸所言,“这种形式的互助合作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有偿交换和合股经营”,它的制度基础是“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劳动互换和集资购买农具是完全依附于私有制的补充性和辅助性制度安排”。<sup>③</sup>正源于此,纵然在上级部署层面,该时段的农村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在具体的乡村实践中原有的小农逻辑还未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农民个人的发展需求仍有一定的融合空间。这也是这个阶段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的原因。

与此同时,必须认清的事实是互助合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反对互助合作中的“左”倾冒进时,上级仍强调,不能长期停留于小农经济,必须“把农业集体化当作农村中主要的建设任务”。<sup>④</sup>邓子恢指出,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sup>⑤</sup>中央认为,保护单干与富农的前提是坚持对富农经济的领导,把它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随着统购统销政策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农业唯一的道路。聊城县委将上级指示转化得更具操作性:取消“生产发家,生产致富”的口号,变更为“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sup>⑥</sup>国家自此走向了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以提高生产的新阶段。

## 结 语

农村生产发展表现出的阶段性转变看似是偶然的,实则背后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建政初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经济,这就需要延续旧有的经济体制,保留多种经济成分的竞相发展,以此活跃农村市场。但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一直是党内外的共识,无论是1951年山西省委与华北局就互助组内部是否应逐步否定“私有基础”展开的争论,还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贫富分化问题的讨论,双方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认可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都肯定“组织起来”的根本方向。争论的分歧只不过是过渡的时间与条件上有所不同。

当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之时,中央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会自然地冒发出来,因为实现社会主义一直是党的既定目标。一旦社会实践中发生与此目标相背离的倾向,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很快就会成为上下层的共识。<sup>⑦</sup>笔者基于聊城县的史料爬梳,发现这个转变是以1951年抗美

① 《解部长报告整党工作》(1951年) 档案号:3—1—25,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② 《聊城县委宣传部庆祝国庆三周年,我县三年来的伟大成就》(1952年9月26日) 档案号:3—1—34,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③ 高洁、辛逸《长治老区互助组织与社会主义——山西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新解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126页。

⑤ 《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4月23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第138页。

⑥ 《县委扩大会议记录》(1953年11月4日) 档案号:3—1—56,东昌府区档案馆藏。

⑦ 之所以能达成“上下共识”是因为上下级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上级的动力主要是党内高层自建党之日起就奉为圭臬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下层动力是指贫苦农民从小农经济土壤中产生的均平财富的欲求,即平均主义。在生产落后现实条件下,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被混淆,比如“公有”“反对贫富分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动员底层民众的旗帜,或民众响应变革浪潮的力量之源。



援朝运动与农民贫富分化的凸显为划分节点。这看似是不搭界的两个独立事件,但它们引起上级重视的原因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是超出中央预设范围的突发因素。上级通过抗美援朝运动发现农民不关心政治运动,只关心个人生产以求发家致富。这种“不问政治”的发展倾向,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并不相符。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更是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相背离。心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贯主张,再加上内外部的刺激因素,中央领导人将提前过渡的任务提上日程,并逐步诉诸实践,就不足为怪了。<sup>①</sup>

当然,这种转变还与中央领导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界定有关。前文以1951年下半年为分界点将前后分为“致力于生产力”与“侧重生产关系变革”两个阶段,这是笔者用后人眼光进行的划分。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两个阶段所代表的路径或主张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前者是通过承认并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以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后者致力于削弱乃至消灭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途径。因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看来,生产关系的革命就是提高生产力的最大动力。早在1937年毛泽东已提及,“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sup>②</sup>他于1960年更是坦言,“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sup>③</sup>只要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那个时代党内高层的共识。其实生产关系并无先进落后之分,只有与生产力适不适应之别。尊重生产力的客观规律是后人以此为鉴得到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林超超)

---

① 薄一波曾披露,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相比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这就将过渡的时间节点提前了一年。而在辛逸的论述中,山西省委与长治老区试办的十个合作社已于1951年实践着“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这为中央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提供了一个地方个案。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发展规划下,新民主主义理论究竟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得以践行,也许值得重新审视。以各地史料为基础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将对如何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与社会主义提供新的思路与认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151页;辛逸、高洁《“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期山西省委与长治老区的十个合作社》,《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1998年,第571页。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Production from 1949 to 1953 : Taking Liaocheng County as an example**

WU Shu - li , XIN Yi

There were always two points of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path of rural prod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One thought adhered to the theory of new-democratic society; the other thought stressed that state could directly go to the socialism development road by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ocal practice ,two kinds of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were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express the nati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direc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from 1949 to 1953 in Liaoche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author found that two kinds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were not either-or ,but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and Ranke’s Historical Thought**

WANG Ju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Ranke’s idea that is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And it also testifies tha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is a fruitful and unique theory system.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should include four points. Firstly,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stresses on researching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ries to use primary source; Secondly ,it opposes to abstractly summarize history and stresses the “feeling”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irdly ,it emphasizes more narration than judgement and it uses literary skills to repea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ourthly ,it advocates writing more political history and limit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is the way that Ranke explores God’s will and human wisdom. On the other hand, “as it actually happened” is a noble pursuit ,which is used to judge the past ,guide the present and help the future.

**Reflection on the Studies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China**

HUO Xin - bin

Many remark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China have been crea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till existing in the fields such as the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the refere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ory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ties of research ways and methods ,the expansion and depth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mes ,which possess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se problems can provide som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Rare Document Revealing the Japanese Troops Comfort Stations “Rules and Roster of Jilinhui in Jinhua , Zhejiang Province”**

SU Zhi-liang , CHEN Li-fei

There’s a “Rules and Roster of Jilinhui( 鸡林会) in Jinhua” collected in Jinhua archives. It revealed that Japanese troops established a sex slavery named “comfort women” in Jinhua area. Confirmed by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survey ,there were 11 comfort stations bookkeeping ,8 military brothels bosses ,7 comfort station managers and 126 “comfort women”. The number of “comfort women” was up to 60% of the total number in Jinhua Jilinhui Koreans ,the youngest was only 17 years old. A total of 141 comfort people ,accounting for 67.19% of the Jinhua Jilinhui Koreans ,the proportions were staggering.

( 池楨、徐锋华 译)